

蘇聯解體及其影響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蘇聯解體了，這是足以改變世界的大事。它為什麼會解體？其過程如何？有什麼影響？這正是本文要試作分析探討的問題。

一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依照馬列主義 (Marxism-Leninism) 或稱共產主義 (Communism) 圖式建立起來的共黨政權，但這個主義早已不合時宜，這是蘇聯定然會解體的最根本原因。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進步會帶動社會的變革，他說過：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①

馬克思本人所處的是蒸汽磨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他的革命和對未來社會的構想，都是為了要推翻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設計的。可是，那個時代早已成為歷史陳蹟了，人類社會的生產力，還怎能以蒸汽磨為代表呢？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個剝削制度，私有財產為萬惡之源，自由競爭的商品社會會造成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每次危機都會造成資本向少數人手裏集中，社會向貧富兩極分化，工人階級永遠貧困，必須起來埋葬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馬克思生前，人類工業化過程已由輕工業時代進入重工業時代，由於重工業建設時間長，需要資本額高，個人無力舉辦，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它所代表的不是資本集中，而是資本社會化（所有權分散）。

註①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八月版），一〇八頁。

馬克思已經親眼看到此一現象。他死後由恩格斯整理他的遺稿，於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篇第廿七章中的「Ⅲ」，就是「股份公司的成立」。「Ⅳ」把股份公司又加以闡述。在這兩節中，包括括號內恩格斯的話，說明股份公司是新的產業經營形態；舊日的自由競爭制度已經到了末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自身之內的揚棄；它會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在資本主義體系自身的基礎上實行揚棄；也提到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以及加特爾（Cartel）的出現，在一定部門內形成獨占（Monopoly），並且引起國家的干預。可惜馬恩並沒有在這方面投予更多的注意。甚至認為股份公司制度沒有克服財富當作社會財富的性質和當作私有財富的性質間的對立，卻不過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它。②換言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股份公司並未全面肯定，更不曾因它而改變自己對公有制的主張。

另一方面，誠如大陸人士吳耀輝所說，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從一九五六年起，單純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日漸減少，而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的白領工人成為生產的主力軍，職工中持有股票的人數也急劇增加。③綜上所述，可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早已被事實所否定。

俄國十月革命後，由列寧肇始經史達林完成的政治經濟模式，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構想，再加上列寧主義——俄羅斯傳統的高度集權形式建立起來的。

在經濟方面，其公有制實行的結果，正如戈巴契夫所說：國家所有制變成了無主的。④這是說，誰都不必為國有財產負責，但誰都想從那份財產上分得一些利益。再則人們不能直接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大家就都不想認真勞動。

「依照預先規定的計畫來進行社會生產」，⑤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張。蘇聯就實行中央計畫制度，剝奪企業經營者（經理、廠長等）的自主權。將企業分屬於行政部會，形成官僚經濟。各企業間沒有競爭，也就失去刺激進步的因素。再加上公定物價，使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間脫節，完全扼殺市場機能。以上種種，就足可阻礙經濟的正常發展。

蘇聯為急求工業化，自始就採取重工業優先政策。再者，正如戈巴契夫所說：

「……這方面表現出來的教條主義加劇了我國經濟的消耗性，這種消耗性有極大的慣性力，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中期。這就是我國經濟不久前還在遵循所謂「抓總產值」這個方針的根源。」⑥

註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五五六—五六四頁。

註③ 吳耀輝，「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再認識」，社會主義（上海科學院，一九八九年四月號）。

註④ 戈巴契夫在蘇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一月的報告，真理報（蘇聯，一九八七年一月廿六日）。

註⑤ 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第一集（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十月輯印），一六六頁。

註⑥ 戈巴契夫，改革與新思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三四頁。

「抓總產值」換個方式說，就是追求「生產總量」。蘇聯那些「一大二公」的企業，在員工吃「大鍋飯」的心理下，為獲取獎金而追求生產總量，造成品質不良及大量廢品，自然是經濟的消耗。更嚴重的是，當人類社會工業化進展到以半導體和新素材的生產為代表的電子工業（electronics）時代，除了需要高性能的機器設備外，全體員工都要遵守紀律，有旺盛的生產意願，工廠室內空間及產品品質，要有嚴格的管理。如此一來，蘇聯現有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員工知識與習性，勢非全面更新不可。

二

蘇聯那種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央統制型的經濟體制，必須建立在同樣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基礎上，這個政治基礎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蘇聯共產黨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的主張，列寧特別加以強調。依大陸人士王正泉的說法，列寧提出過兩項基本原則：一要堅持共產黨對政權機關的領導，二要明確劃分黨政機關的職權。^⑦這兩項原則，即使不是互相矛盾，也很難把分際拿捏得準。因此，王正泉認為蘇聯歷屆領導人，都忽略了列寧劃分黨政職權的思想，而實行「黨政融合制」。其特點就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它的表現形式是：

（一）黨制定方針政策，對重大問題作出決策，交政權機關負責執行。（二）黨直接向政權機關輸送幹部，實行黨政領導職務的兼任，使黨政大權集中在同一一些人手裏。（三）黨政機構重疊，黨內設立許多同政府部門對口的部門，使黨的機關代行政權機關的許多職能。（四）黨政聯合發布決議，由黨的機關直接向廣大幹部和群眾發號施令，如此等等。^⑧事實是，十月革命後，一九一九年三月的共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就大大擴充了黨中央機關。一九二〇年列寧說過，國家內政、外交政策的一切問題，都由黨中央政治局決定。於是黨中央政治局，就成為國家最高決策機構。一九二一年三月共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後，政治局地位就愈形重要。史達林獨裁體制形成後，政治局更成為其個人之御用工具。此後，蘇聯的領導人，必須先具備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資歷，才能爬上最高領導地位——總書記。

註⑦ 王正泉，「從蘇共二十八次大看蘇聯黨政關係的根本變化」，D「外國政治、國際關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一九九一年第二期），一一八頁。

註⑧ 同註⑦。

。這樣黨政人事可獲安定，但也極易形成思想僵化和年齡老化現象。特別是布里茲涅夫時期，以安定為尚。他所主持的蘇共廿六次代表大會（一九八一年二月，是他主持的最後一次大會），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四人，全員留任，平均年齡六十九歲。另一方面，爲了使各共和國效忠莫斯科，他實行「委任統治」，即將共和國統治委諸一人，如庫納耶夫（D. A. Kunaev）任哈薩克共和國第一書記掌握統治權廿三年，形成「獨立王國」。只要完成生產任務、繳納糧食、忠於莫斯科，他就可以在共和國內爲所欲爲。

布里茲涅夫晚年，蘇聯統治階層老化昏聩、貪污、紀綱蕩然，社會風氣腐敗，都與上述制度及個人作風有關。

蘇聯的另一個特點是，境內有大小民族與部族百餘種，是一個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統一國家。它的名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但它的十五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非都是自願加盟。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乃一九三九年德蘇協定秘密附件中將該等國家劃歸蘇聯。一九四〇年爲蘇聯佔領，經領土改劃成爲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但從未獲西方國家的承認。第二次大戰後，蘇聯從羅馬尼亞割取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及北部布柯維納（Bukovina），比薩拉比亞東南臨海部分及北布柯維納併入烏克蘭，其餘部分與原屬烏克蘭的摩爾達維亞自治省合併爲摩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現名摩爾多瓦。此外，蘇聯從波蘭、捷克都獲取土地，從波蘭東部割取約佔波蘭面積百分之四十的土地。這更增加了各民族、各共和國之間的糾葛。

大陸人士金寧在「蘇聯的聯邦制遇到麻煩」一文裏，有下面一段文字：

「造成目前危機的原因十分複雜。去（一九八九）年蘇共中央九月全會通過的『黨在當前條件下的民族政策綱領』指出，由於長期的政策失誤，聯盟條約和憲法規定的共和國主權『徒具形式』，『官僚主義態度壟斷了一切，影響到所有領域——從生產力部門到語言、教育和文化』。一些加盟共和國的代表抱怨說，共和國甚至連修建二〇〇張病床以上的醫院或投資四〇〇萬盧布以上的項目的權力都沒有。與此同時，從二〇年代的強制集體化，三〇年代的肅反擴大化，戰爭年代的少數民族大遷移，直到後來黑魯曉夫和布里茲涅夫時期推行的『民族融合』政策等更嚴重傷害了各民族的利益和感情。所有這一切『交織在一起，擰成了一個死結』（戈巴契夫語）。」^⑨

所謂少數民族大遷移，是第二次大戰期間，史達林以某些少數民族曾經通敵或有同情德軍嫌疑而予以整個放逐。又，一九七七年的布里茲涅夫憲法序言中鼓吹：

「各階級與社會階層相互接近，各民族、各部族在法律與實際平等及兄弟合作之基礎上，已產生人類新興之歷史共同體

註⑨ 金寧，「蘇聯的聯邦制遇到麻煩」，世界知識（北京，一九九〇年）第廿一期，二二頁。

——蘇維埃人。」

這可視為「民族融合」政策的表徵。事實證明，民族大遷移固然種下仇恨，「民族融合」（實即同化政策——耀）也毫無功效，各民族間的一切瓜葛與矛盾依然故我，只是伺機迸發的火山。

三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上台時，蘇聯的現實已達非全面改革不可的地步。因而，戈巴契夫曾把他的改革稱為革命。實質上，他所做的仍是由上而下的體制內改革，而非由下而上的革命。二者的不同之點是，革命以群眾為基礎，是反體制的行動；改革是在體制內，以官僚、幹部為骨幹，而他們正應是改革的對象，要改革就要傷害他們的既得利益，因而不易成功，在蘇聯更特別是如此。

大陸人士馮紹雷為文指出：

「對戈巴契夫本人而言，很難說其一上任就形成了全面改革的戰略思想。蘇共廿七大上，……當時強調的只是經濟上的『加速戰略』，要求『完善』社會關係。」^⑩

蘇聯的經濟改革不今日始，但戈巴契夫的改革已經觸動史達林模式的本身。不過，在經改方面，也並非一開始就有一套一貫性的完整計畫。

蘇聯經濟從一九七五年就開始停滯，布里茲涅夫晚年，係依靠釀酒、出售黃金及輸出石油（其時石油正漲價中——耀）等來支撐。釀酒雖可獲利，但酗酒損害人民健康，也影響勞動紀律。據官方統計，蘇聯酒精中毒人口經常為二、〇〇〇萬人，實際數字應為此二倍。回教民族不飲酒，則中毒人口應多為斯拉夫人。戈巴契夫上台後雷厲風行禁酒，致使私酒猖獗，中毒人口未減，而伏特加銷售量減少三分之一，交易稅減收三六〇億盧布。

出售黃金自有其限制，石油跌價使外匯收入減少。加之，車諾比爾（Chernobyl）核電廠災變、亞美尼亞地震，隨同社會開放而來的罷工、民族抗爭等等，都造成經濟方面的嚴重損失。

戈巴契夫的經改戰略，係以科技進步帶動經濟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畫（一九八六至九〇年）期間，現有機器三分之二不再修理，報廢機器總值二、四〇〇億盧布，須大量投資重工業，以便更換設備，以致影響民生物資的生產。又因輸出石油跌價、

註⑩ 馮紹雷，「一九八八年的啟示——論蘇聯體制改革的特徵」，D/T外國政治、國際關係（一九九〇年第一期），一〇五頁。

外匯收入減少，消費品輸入不足，致一九八九年超，社會物資就開始奇缺。改革過程中，員工收入增長速度超過物質增產速度，引起物價上騰。政府除增發鈔票外別無良策，又使通貨膨脹速度大增。另一方面，儘管蘇聯的經改相當大膽，但仍然可看到共黨意識形態的暗中影響。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蘇聯通過「個體勞動法」，允許參加社會生產的成年公民在業餘時間，以及家庭婦女、殘障人士和領取養老金者和大中學生從事個體勞動活動，其服務範圍多達廿九項。在農村則允許實行家庭和個人承包，即「非傳統的承包制」。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七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說，過去在對待個體副業和個體勞動的看法上，發生嚴重的誤解，造成了經濟上和社會上不少的損失。蘇聯的理論界也否定了過去認為「小私有生產是舊的封建殘餘」，「會動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觀點，肯定個體勞動是「對社會生產的重要補充」。這是一項有助經濟活化的改變。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五、十六日蘇共中央全會中，戈巴契夫演說主張農業自由化，然保守勢力強烈反對，通過的改革僅有：透過承租，使農場民營化；提供更多的金錢和物資獎勵，鼓勵農民生產；進行物價改革；撤銷原有的管理農業的跨部門組織，因為該組織規章運作繁複，效率不彰。^⑪農業承租的農地期限為「五十年或更久」，並可由子女繼承。^⑫蘇聯最高蘇維埃於同年十一月起討論「土地法案」，一九九〇年二月三讀通過，規定土地由國家所有改為地方蘇維埃支配與管理，有條件承認人民對土地有終身使用權及繼承權。同年十二月三日俄羅斯共和國國會通過決議，要實行土地私有制。廿四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中，戈巴契夫提出新的聯盟條約，就土地私有問題舉行全民投票。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戈巴契夫公布新的土地改革措施，凡經營不善的耕地，將經由土地銀行重新分配，給予不隸屬現有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的農人作租賃、合作等計畫之用，却未提土地私有制。^⑬

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所有權法」，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公民所有，第三章集體所有，第四章國家所有，第五章合辦企業、外國人、外國組織和外國所有。這樣，所有制是多樣化了。依順序言，公民所有應優先於集體和國家所有。然而，使用「公民所有」而不用「私有」字樣，就是只承認部分生產資料可以私有。細察其內容，該法第二章公民所有第六條中，關於公民所有的通則：(一)公民所有，由其參加社會的生產活動及由個人經營的勤勞所得，投資信用機關、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的收入，繼承財產的取得，其他法律許可的獲得等產生並增大之。(二)公民對生產及創造活動行使自己的能力，有獨占的權力。公民可獨立行使其權力，或依據勞動協約行使之。(三)公民經營農業及個人副業、園藝、種植蔬菜

註⑪ 中央日報，台北，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第六版。跨部門的農業管理組織應指國家農業委員會，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創立，由戈巴契夫提議撤銷。

註⑫ 聯合報，台北，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第十一版。

註⑬ 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一月七日，第八版。

、建設住宅及其他法律規定的需要，可授予土地作終身使用，並得繼承之。

第七條是公民所有的標的物，包括住宅、別墅、家庭菜園的房屋、地上種植的樹木、運輸工具、現金、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家庭用品、個人消費物資、農業及其他勞動事業、自留地、園藝、菜園、個人經營及其他經營必要的生產工具、生產的農產品的收入及其消費財、生產財。^⑭

由上述條文看來，私有的範圍仍極有限。

一九八九年年底，蘇聯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通過關於制定明確的、分階段向可調節的市場經濟過渡的綱要，包括穩定國家社會經濟狀況的緊急措施的決議。一九九〇年春以降，蘇聯國內就展開如何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討論。同年六月十三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由中央計畫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計畫大綱。七月二日起的蘇共第廿八次代表大會經過激烈爭辯，最後也承認了上述等決議。對於轉型速度，各方意見不同。經濟學家夏塔林(S. S. Shatain)曾提五百天內轉向市場經濟的計畫，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N. I. Ryzhkov)提出較為保守的政府案，十月十七日戈巴契夫向最高蘇維埃提出容納上述兩方意見的第四度修正的經改方案，但遭葉爾欽(Boris N. Yeltsin)強烈批評，揚言俄羅斯共和國將自十一月一日起單獨執行「五百日經改計畫」。十月十九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以絕對多數通過贊同戈巴契夫所提包括過渡四階段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這些方案中，都只談市場經濟，沒有了「有計畫的」「可調節的」等等字樣。但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六日蘇共中央全會通過的新綱領草案中，擬將蘇聯共產黨改造成西歐型的議會政黨，聲稱要實行混合經濟，承認所有形態的多樣化，然而仍舊拒絕全面私有化。^⑮

戈巴契夫的改革方案，常常受到保守派的干擾，是不徹底的妥協的產物。就是戈巴契夫本人也始終未完全擺脫共黨意識形態的陰影。一九八六年二、三月間的蘇共廿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共綱領新版本」，強調「蘇共的最終目標是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以俄文和英文同時出版的戈著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指稱蘇聯經濟困難是「社會主義的潛力沒有充分發揮」。前述「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表決前，戈巴契夫講話時說，向市場過渡「並不意味着放棄社會主義」，「人們珍惜社會主義的理念」。直到蘇聯解體後，他還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在法國解放報上撰文表示，雖然蘇聯的制度失敗，但社會主義並未死亡。^⑯其主觀意識如此，改革步驟則被客觀現實拖着走，結果失敗也就不足為奇。

註⑭ 摘譯自「蘇聯所有權法要旨」，朝日新聞(日本)，一九九〇年三月七日，第六面。

註⑮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九一年七月廿七日，第五面。

註⑯ 香港時報，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第二版。

四

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戈巴契夫未曾忘記政治體制改革。在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就在黨政關係的改革。戈巴契夫總書記任內有三次黨的重要大會。一是一九八六年二、三月間的蘇共第廿七次代表大會，戈巴契夫在政治報告中提出，黨是「政治領導機關」，要放棄「管理職能」和「命令指示方法」，這是「黨政分工」的思想。二是一九八八年六月第十九次全國黨代表會議，強調「恢復蘇維埃的全權」，黨的政治方針應通過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的黨員去貫徹執行，不能對國家機關作直接指示。另一方面，要「改變黨的機關結構和組成」，放棄黨的機關「按管理部門相應劃分的做法」。這是「權力移交」。三是一九九〇年七月的第廿八次代表大會，強調「黨政分開」，放棄蘇共法定的領導地位，推行多黨制和總統制，實行三權分立。^⑰

正如同馮紹雷所說，蘇共廿七大時，戈巴契夫沒有使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初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在一九八六年七月底他視察遠東期間。決定性的變化發生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蘇共中央全會上，當時，戈巴契夫明確表示：「經濟發展最終取決於政治民主化」。同年六月全會，除作出有關經濟體制改革原則性決定外，又決定一年後召開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和擴大社會民主問題。^⑱

一九八八年六月的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決定改組黨和蘇維埃，把權力由黨移歸蘇維埃，一方面使蘇維埃接近真正的議會制度，一方面使黨僅作內外政策基本戰略和思想教育的指導，不再直接介入立法與行政。同年九月中央全會，通過決議，改組中央機構。蘇共中央原轄廿一個部會中，撤銷十個經濟關係部。另設黨建設與幹部政策問題等六個委員會。一九九〇年十月又增為十一個委員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關於修改和補充蘇聯憲法的法律」，成立人民代表大會(Congress of USSR Peoples Deputies)，由人代會選出具有議事功能的最高蘇維埃為常設機關，並由人代會選出最高蘇維埃主席，為具有實權的國家元首，兼有議長功能。一九八九年三月選舉，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戈巴契夫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這樣，權力由黨轉移給政府，並不影響戈巴契夫本人的權力。問題是黨既未完全放權，最高權力機關缺乏執行法律的有效機構，最高蘇維埃主席權力有限，由於程序繁雜，無法在必要時採取行政的強硬措施，致使許多問題懸而不決。

註⑰ 參閱王正泉，「從蘇共二十八次大看蘇聯黨政關係的根本變化」，前揭雜誌，一一九—一二〇頁。

註⑱ 馮紹雷，「一九八八年的啟示——論蘇聯體制改革的特性」，前揭雜誌，一〇五—一〇六頁。

戈巴契夫原本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且拒絕實行總統制的，但迫於內外形勢，乃於一九九〇年二月蘇共中央全會中，親自提議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及實行總統制，全會通過的黨綱草案中，強調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三月十三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第六條，廢止「法」定的共黨專政地位。十五日選舉戈巴契夫為蘇聯第一任總統，於當日就職。

真正的「黨政分開體制」，體現於一九九〇年七月的蘇共第廿八次代表大會。其時戈巴契夫雖仍當選總書記，但新設一副總書記，以便戈氏可專注於總統職務。國家大事的決策權由黨的中央政治局轉歸政府的總統委員會，而戈巴契夫改革派的菁英分子，也全部網羅到總統委員會。

戈巴契夫是忠實的共產黨員，但迫於現實不得不從事「非黨化」的政治改革，自然會受到保守分子的反對，甚至戈氏自己的隊伍內也會有人出列。李加契夫(Ye. K. Ligachev)和雷日科夫(N. I. Ryzhkov)二人，都是戈巴契夫上台後，於一九八五年由中央書記直升為政治局委員，但後來他們都變得保守，前者堪稱其旗手。另一個典型是葉爾欽，他於一九八五年七月被任為中央書記，十二月廿四日接任莫斯科市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八六年被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他自就任莫斯科第一書記後，即大力抨擊特權及發表激進主張。一九八七年十月蘇共中央全會中，葉爾欽公然指摘官僚體系妨礙改革，且指名抨擊李加契夫，被戈巴契夫認為「政治上不成熟」。他於十一月被迫辭莫斯科市第一書記職務，並被解除政治局候補委員及蘇聯最高蘇維埃之職位。以後他便走向與戈巴契夫對抗之路。

一九八八年三月中旬起，也就是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召開前夕，保守與改革兩派利用傳播媒體展開文字辯論。李加契夫指稱戈巴契夫經濟改革，未能使蘇聯經濟好轉，反而使食品不足、失業與通貨膨脹有更趨嚴重之勢。五月三十日葉爾欽在莫斯科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訪問時，指李加契夫「應對蘇聯改革進行緩慢負主要責任」，要求李氏辭職。十九次代表會議在激辯中進行，有二〇九人公開反對蘇共總書記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同年九月三十日的蘇共中央全會中調整人事並改組中央委員會，原被目為蘇聯第二號人物、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加契夫未能出任新設的意識形態委員會主席，而改任農業政策問題委員會主席，被認為失勢的象徵。

一九九〇年七月的第廿八次代表大會，各種觀點、各派力量激烈交鋒，迫使戈巴契夫一再強調要團結「健康力量」。這次大會將李加契夫排除出中央。但葉爾欽首先宣布退出蘇共，繼之，莫斯科市長波波夫(Gavril Popov)、列寧格勒市長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以及七位國會議員也聲明脫黨。進入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戈巴契夫的親信業已辭去外長職務的謝瓦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宣布脫黨，與其他八名改革派人士另組「民主改革運動」。七月十日葉爾欽就任俄羅斯共和國總統，以平等地位與戈巴契夫抗衡。廿七日，戈氏最主要智囊雅科伏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宣布辭職，離他而去。

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立陶宛修改憲法實行多黨制，立陶宛共黨宣布脫離蘇共而獨立。跟着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也廢止共黨專政條文，格魯吉亞共黨也於同月宣布脫離蘇共。最重要的是，蘇共原本是由俄羅斯共產黨擴大為蘇聯共產黨，因而俄羅斯共和國不另設黨中央。一九五六年二月廿七日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時，在中央成立俄羅斯聯邦局，由蘇共第一書記黑魯曉夫兼任該局主席。一九九〇年六月廿日俄羅斯共和國共黨大會，票決將該次大會改為「俄羅斯共黨」成立大會，另立中央，並選舉保守派的波洛茲科夫（Ivan Polozkov）為第一書記，他想向蘇共「收復失地」，即爭奪黨的權力。七月廿日，葉爾欽以總統身分下令禁止在俄羅斯境內工作場所進行任何政治活動。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五、廿六日的蘇共中央全會，是對蘇聯未來政治動向「具有特殊意義」的全會，主要議題就是討論蘇共的新黨綱草案，確定黨「往那裏去」。首由蘇共綱領起草委員會主席、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就草案提出報告。其基調是在理論基礎、政治綱領和組織原則方面「改造」蘇共，以適應推行「新思維」的需要。他說：「過去黨只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現在必須使我們的思想庫內包括國內外社會主義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財富」。他認為蘇聯幾十年來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已經站不住腳了」，「需要再一次改變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全部看法」。他說，蘇共今後一個時期幾個重要的綱領性目標是：「把聯盟國家作為各主權共和國的民主聯邦保留下來並加以革新」；「向市場經濟過渡並建立強有力的社會保護」；「實現國家現代化及其與歐洲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他指出關於蘇共名稱改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的問題，應該由蘇共代表大會決定。他表示不必擔心蘇共的「社會民主黨化」，認為蘇共同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分歧「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歷史進程取消了造成在工人和民主運動中、在社會主義擁護者中劃分界線的許多問題。」¹⁹黨綱草案已是第八稿，不必細讀其內容，單只聽聽戈巴契夫的報告，就使若干改革派份子也會張口咋舌。

戈巴契夫在報告中，對「蘇共布爾什維克派」（一九九一年四月在明斯克成立）和「共產主義倡議派」提出尖銳批評。也談到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伊（A. Rutskoi）籌建的「俄羅斯共產黨人民黨」未作評價，對謝瓦納澤等發起的「民主改革運動」隻字未提。對葉爾欽的「非黨化」命令，認為「是在使本來就充滿衝突的局勢複雜化」。²⁰

一九九一年四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中，戈巴契夫承認蘇共內部已有三、四個黨。七月全會中，他又透露，從一九八六年第廿七大以來，退黨黨員四〇〇萬人，黨員人數由一、九〇〇萬降至一、五〇〇萬人。另據外社報導，黨員中購真理報的不過五分之一。²¹很多黨員（包括不滿軍人）出賣黨證給美國遊客，每證價值二〇至三〇美元。²²

註19 王崇杰，「在複雜形勢下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世界知識（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六日號），六頁。

註20 同註19。

註21 世界週報（日本），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七日號，一〇頁。

註22 香港時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第二版。

黨內分裂，領導階層互鬥，黨的威信掃地，實為改革失敗之一大原因。

五

更嚴重的是隨着改革過程中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公開性」(Glasnost)而來的，是各種社會勢力的興起和民族主義的抬頭，使得蘇聯的聯盟制度也發生了問題。一九八八年二月以降，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為爭奪納哥諾·卡拉巴赫自治省(Nagorno-Karabakh, A.O.)而大動干戈。一九八九年四月格魯吉亞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者，要求退出蘇聯。一九九〇年三月十日，立陶宛通過獨立宣言，三十日愛沙尼亞、五月四日拉脫維亞也相繼通過獨立宣言，十一月格魯吉亞發表獨立宣言。同年中，還有俄羅斯(六月十二日)、土庫曼(八月廿三日)、塔吉克(八月廿四日)、哈薩克(十月廿五日)等共和國都發表「主權宣言」，聲稱自己為主權國家，在其境內，共和國法律優於蘇聯法律。主權宣言的始作俑者為俄羅斯，其他共和國起而效尤，這使得戈巴契夫不能不予重視。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二日，戈巴契夫主持召開了聯邦委員會會議，專門討論蘇聯國家體制問題。就在這次會議中，戈巴契夫提出建立「主權的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構想。根據此一構想，共和國作為一個主權實體，可以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同中央政權建立關係，只要它能够保留國家的完整並充分體現各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特點及傳統。他認為這種「自由的」聯盟並不意味着蘇聯的瓦解和分離，因為隨着蘇聯經濟的改革和面向市場，將會形成一個對大家都有利的統一的蘇聯大市場。由此經濟因素自然形成各共和國相互接近和相互聯繫的紐帶，從而也將成為聯盟存在的最好基礎。他把「主權宣言」看作起草和簽署新聯盟條約的必要前提，他說這些「宣言」不具有憲法性質，不屬於法律文件。²³

關於新聯盟條約的構想，經多次研商，但對於聯盟的性質、權限、簽約範圍等等仍多爭論。²⁴另一方面，蘇聯的經濟情況不斷惡化。一九九〇年一至四月，首次出現幾十年未有的社會生產絕對值負成長的情況，國民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一·七%，居民收入却激增一三·四%。消費市場供求和財政收支兩大失衡進一步加劇。這更會促成政治的不安。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起的蘇聯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於廿四日通過了新聯盟條約的構想。由於爭論激烈，戈巴契夫提議就是否保留聯盟

註²³ 金寧，「蘇聯的聯邦制遇到麻煩」，前揭雜誌，二／三頁。

註²⁴ 詳請參閱註²³。

問題舉行全民投票。廿七日人代會通過「蘇聯全民公決法」。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六日最高蘇維埃決議於三月十七日舉行全民投票。投票如期舉行，投票者占擁有投票權公民的八〇%，投肯定票者七六·四%。²⁵不過，這時摩爾多瓦（前摩爾達維亞）、亞美尼亞兩共和國也已決心獨立。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三日，戈巴契夫和包括葉爾欽在內的九個共和國領導人發表「九加一」聲明，被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吉揚諾夫（A. I. Lukyanov）指為「憲法政變」。七月廿三日公布了新聯盟條約第四稿，決定於八月廿日正式簽署，十九日爆發短命的「八月政變」。政變後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中有十三個先後實行和宣布獨立。

政變後共黨先行解體，戈巴契夫仍繼續推動「主權國家聯盟條約」的簽署，另一方面呼籲各共和國締結經濟聯盟，後改稱「經濟共同體」。十月十八日，戈巴契夫和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及亞美尼亞八個共和國簽署了「經濟共同體條約」。十一月六日，烏克蘭和摩爾多瓦也在條約上簽了字。政變後新成立的蘇聯最高管理機構——由各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組成的國務委員會於十一月十四日審議「主權國家聯盟條約」草案，訂於十一月廿五日召開的國務委員會上草簽。但該次會議中意見紛歧，無結果而散。戈巴契夫又幾經努力無效，原擬議於十二月正式簽署新聯盟條約的計畫遂告流產。

十二月七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楚克（Leonid Kravchuk）和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Stanislav Shushkevich）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Minsk）會晤後簽署聲明稱：三國組成獨立國家聯合體（國內亦譯獨立國協），宣布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理政治現實不復存在。十二日，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土庫曼等中亞五國領導人集會於土庫曼首都阿什哈巴德（Ashkhabad），決定有條件加入「獨聯」。繼之，摩爾多瓦、亞美尼亞、亞塞拜疆也加入，使「獨聯」成員成爲十一個。廿一日，十一個共和國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Alma-Ata）簽署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定書和「阿拉木圖宣言」，宣稱蘇聯不復存在。廿五日，戈巴契夫發表電視談話，正式辭去總統職務，將核控制按鈕移交葉爾欽，蘇聯正式解體。

蘇聯（Union of Sovereig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由共產黨領導，有一個由選舉產生的最高蘇維埃爲中央權力機構，統一領導整個聯盟國家。各加盟共和國必須遵守聯盟的憲法，各加盟共和國的所有公民具有統一的蘇聯國籍。

戈巴契夫擬議中的「主權國家聯盟」（The Feder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則提高加盟共和國的主權，使共和國憲

註25 波海三國、亞美尼亞、格魯吉亞、摩爾多瓦六共和國拒絕舉行公民投票，然其內部一些自治共和國、工廠、企業和軍隊自行設立投票站，共有二〇〇萬以上公民不願當局禁令投票。

法凌駕於聯盟法律之上。共和國有權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對本共和國領土上的一切自然資源擁有主權，有獨立外交。不過，「主權國家聯盟」仍是一個國家實體。設有中央機構和總統，擁有統一的武裝力量，統一的對外政策，統一的貨幣和統一的市場。只是實際權力中心已移到共和國，是一個鬆散的邦聯式國家。

「獨立國家聯合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內涵猶未明朗。其主要特徵似乎是：沒有中央領導機構、沒有總統，不具有國家性質，不是凌駕於國家之上的實體，只設立由各成員國代表組成的協調機構，那是一種組織。聯合體內的成員國彼此平等，是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只是協調各國的經濟環境、進行經濟、科技、文化等互利合作，協調對外政策，以及對「共同的軍事戰略空間」進行統一指揮和對核武器的統一控制。²⁶

獨立國家聯合體既不是國家，也不是一個政府，更不是單一的軍事集團，能否成爲一個經濟聯盟也是疑問。成立後角色不明。各成員國間，面積、人口、資源、經濟乃至文化發展程度差距極大。領土糾紛、軍隊歸屬、核武問題、經濟困難，均待解決。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疆的衝突方酣。而俄羅斯境內，繼車臣英古什自治共和國(Chechen-Ingush A. R.)之後，韃靼自治共和國(Tatar A. R.)，也將就獨立一事舉行公民投票。烏克蘭境內的克里米亞(Krimea)省也將走向自治。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七日，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國會議長在莫斯科舉行秘密會議，討論組成聯合機構問題，包括仿照歐洲議會形式組成一個國會議詢會議。這項建議受到白俄羅斯的支持，若干成員國反對，烏茲別克未派代表出席。這個聯合體的前途仍多艱困。

六

蘇聯解體對整個世界都發生重大的影響，就這個影響的肯定面言，不能不歸功於戈巴契夫，是他的「新思維」把下述觀念帶進蘇聯的外交政策裏：

生存的互相依賴性
對等安全
減少依賴軍事手段
理性的妥協

註²⁶ 參閱沈一鳴，「『聯合體』『主權國家聯盟』蘇聯三者的區別」，半月談(中共)，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四七頁。

透過對話來解決國際間的矛盾等

我們得承認，是戈巴契夫結束了布里茲涅夫的新史達林主義及其晚年的新冷戰格局。戈巴契夫提出過「全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的觀點，那對於依照階級觀點把世界分成東西兩大陣營互相對抗，或是利用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把階級鬥爭國際化等等，乃是一大修正。因此，一些肯定性的影響，是在蘇聯解體之前即已開始的。

蘇聯曾是共黨世界的司令台，戈巴契夫時期意識形態的鬥爭日趨和緩。蘇聯解體後，國際共運更趨衰微，柬埔寨內戰結束，朝鮮半島走向和解等等即其明證。

蘇聯是最後一個殖民帝國，戈巴契夫開始以較為平等的地位對待其他共黨國家。一九九〇年同意兩德統一並加入北約。一九九一年解散「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及華沙條約組織(WTO)，從此蘇維埃帝國解體，東西歐洲間人爲的藩籬撤除，走向和平與合作。

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與雷根總統簽署中程核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INF)，一九八八年宣布單獨裁軍五〇萬，一九八九年從阿富汗撤軍，同年十二月戈巴契夫與布希總統在馬爾他(Malta)舉行會議，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達(Yalta)冷戰體制。在謝瓦納澤擔任外長期間，一直走的是美蘇協調路線，包括在波灣戰爭中的合作，這對於世界和平、使人類免於核戰恐懼是頗有貢獻的，也爲日後自由國家援助蘇聯及其解體後的各共和國打下基礎。

戈巴契夫辭去總統後，曾寫信給雷根說：

這幾年來，我們把全球分裂成對抗陣營的情況克服了，把各國人民的距離拉近了。²⁷

蘇聯在此種情況下解體，對全人類言，是一件幸事。雖然有人對俄羅斯的侵略傳統抱有憂慮，但短期內那些共和國或獨立國家聯合體，對外恐怕還要依循以前戈巴契夫所訂下的政策路線。

註27 香港時報，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第二版。